

严文井同志是我的第一任领导人。我1956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那时刊物的主编就是严文井同志。他的主要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主编为兼任,具体的编务由副主编秦兆阳担当。而办刊宗旨,则由严文井同志遵照中央当时倡导的“双百”方针贯彻执行。那时刊物面貌,也反映着严文井同志的文学理念。

严文井同志任主编期间,《人民文学》上新人辈出,佳作连篇,发表了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孙犁的《铁木前传》等一系列小说精品,使文学事业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那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黄金阶段。严文井同志为此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是值得赞誉、铭记史册的。

我第一次见严文井同志,他的风采出乎我意料。原以为,作为文学界的大领导,难免会有一些官员的气息。而他没有一点点领导者的架子,温文儒雅,和蔼可亲,全然是我阅读他作品时所想象的儿童文学作家模样,淳朴又老到,机智而幽默。实际上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个泰斗级大作家,儿童文学界中里程碑式的名人。

早在大学读书时,严文井同志的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就给了我深刻印象。作品写小姑娘丁丁胆小怕事,经历一次奇怪而艰难的旅行后,获得了勇气。这不仅是学习创作的课本,也使我受到了人生的启迪。参加工作不久,我从他的童话名篇《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又得到了从事业务和对待生活的感悟。

小学生唐小西因贪玩而总把功课推到“下一次”,灰老鼠乘机把他引入永远到不了“下一次”的“下一次开船港”。在这没有时间、一切静止的地方,唐小西终于认识到“时间”的意义。他逃出“下一次开船港”,乘“这次”就开的帆船,回到了妈妈身边。这个故事生动巧妙,被誉为

给人温暖、诗意和美

□纪念严文井同志百年

□崔道怡

童话园地里一朵“绽放的鲜花”。

其实在文学创作上,严文井同志是一位多面手,他的散文卓然出众,也大多具有经典价值。其代表作《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纪念他去世的爱人,他们在各自投奔延安的路上相遇,在革命的圣地相亲相爱,直至她生命的尽头。作品非常感人,有读者慨叹:“奇怪,一个老头,怎么能写出那么唯美、感性的文字?”

我曾为这篇篇读读后感:“那一个夜晚无比珍贵,冥冥中你敞开了心扉。深沉的怀念如浓醉的酒,而你面对的是一盏空杯。这悄悄的祭奠,惟有至亲至爱的人,惟有至亲至爱又永远不再的人,才能享受,才能领会。一个人一生,能喝到这样一杯用心血酿成的酒,该无悔了。一个人用这样的酒祭奠至亲至爱,该无愧了。”

严文井同志编织的花环,无不蕴含浓郁的哲理诗意,被誉为“献给儿童的特殊诗体”。有评论家比喻他是“一口井”,喷涌出的是“柔美的美感”,“好像是底色,铺陈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确实如此,以致“文革”中写检讨,他竟这样开头:“春天,我看一个穿红衣的少女从林荫道上走过来,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

记得阎纲同志回忆“干校”文章,写他被打作“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时的遭遇。“一天深夜,我被批斗后押回所住的大仓库,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阎纲“坐于床头,掂量许久,吃不下去,腹诵诗句,和血和泪”。

有时一个镜头,映现一颗人心。阎纲所记这一细节,曾经使我深受感动。这就是老作家严文井,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都会用他的手臂传递给人温暖的抚慰。严文井同志的一生,就是不断给人以温暖、诗意和美的岁月。他如还在,正值百年。但他何曾离去,他活在亲友和读者的感念里,活在他那千秋万代永不朽的文章里。

诗意,哲思和游戏精神

——怀念严文井先生

□金波

严文井先生已离开我们10年了,他的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童话,仍被一代代孩子所喜欢,而且在读者的阅读中,不断地在发现着他的作品新的意义。他的童话依旧闪烁着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他的许多文字是这么柔美地与我们的心交融渗透在一起,成为我们的精神营养,这就是他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诗意、哲思和游戏精神。

从严文井先生全部的作品来看,从他在理想追求和艺术审美的层面上看,他是更接近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因此当他为孩子写作时,这一艺术个性因为读者对象的不同,就更加丰富多彩。他日后创作的那些美丽的、富于诗意的童话,和他早期的散文一脉相承,都是用感情哺育出来的。他曾说过:“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眼睛和心灵,没有美丽的幻想,没有浪漫的精神……则一定不会有童话。”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严文井,由于与儿童在心灵上的契合相通,就增加了更多的儿童情趣、情调,以及所营造的诗画氛围与旋律感。他的《小溪流的歌》就是一首诗。他曾经说过:“童话虽然很多都是用散文写作的,而我却想把它算作一种诗体,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没有诗的形式的诗篇。”

严文井的童话还有深刻的哲学意味。我记得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散文《世界一点也不稀奇》,他写一个成年人面对一个怯懦的孩子“我”说:“你同一个人一起走,你就有了一个伴,你同许多人一起走,你就会感到热闹;只要你

敢走,怎么样都好。”“于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后来他创作了一系列的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都激励孩子勇敢,敢于在大胆实践中克服缺点,健康成长。他曾经说过:“我的基调是从人生观、世界观上考虑得更多一些。这也是我的一点肤浅的哲学思考”。但是,他的童话绝无耳提面命的训诫。

一个作家,不仅要“了解自己”,还要“顺应自己”,顺应自己的艺术个性。严文井从40年代初开始创作童话,直到老年,他永葆童心,心中充满着青春的绮思丽情,他把对美的追求和对爱的期盼,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他有孩子般的“心灵的自由”。即使最盛行政治童话的年代,他的童话也突显了审美、幽默、智慧相融合的艺术特色。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的童话具有的“超前的游戏精神”。我国的童话创作,直到80年代初,才明确地提出“游戏精神”,一时涌现了一批新人新作。这是儿童文学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今天我们在表现游戏精神的时候,表面上虽然热闹非凡,但从内涵、情趣、语言上,都还有些肤浅、粗糙。严文井童话中的游戏精神是超前的,其艺术价值就在于为我们当下的童话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和探索的范本。

因此,在我们纪念严文井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谈他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时,当我们谈中国当下的儿童文学时,又不能不谈严文井童话中的诗意、哲思和游戏精神,这就是我们怀念严文井的意义。

小溪流的歌

——记严文井同志 □林东海

社第一天上班,文井同志特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望我,他的关怀使我感动不已。9月11日晚上10点多,创办来电话辗转通知我,说中央办公厅有命令,要我于翌日八点半以前到公安招待所集合,有重要任务,特别交代带上毛衣和洗漱用品。我不知底里,只觉得事情严重,去还是不去,在两难之中。我想到文井同志,看了看表,已是深夜11点多,情况紧急,也不管他睡没睡,到邻居家拨通了他的电话,把接到电话的情况向他说明,向他打招呼了没有。他说:“没有通知我,不知是什么事。不过他提到中央办公厅,不会说假话吧,那你就去看一看。嘴可要把得严一些。”于是,我如期于翌日八点半到达公安招待所,于会泳的助理见到我便叫快准备上车,我问:“向我们出版社请假了吗?”他说:“来不及,以后再说。”我说:“不行,我已回社,没有请假,我不能走。”他急得直跺脚:“还有20分钟开车,现在就去找严文井,快!”于是立即驱车到灯市东口出版局办公楼,把文井同志从会议室叫出来。于会泳的助理只是说替我请假,要离开北京,去哪儿,干什么,都没说清楚。文井同志面有难色,说:“我做不了主呀,没有和社里其他领导商量过,等商量了再说吧。”于会泳的助理两手一摊,急得话也说不清楚:“怎么办,马上就要去上火车了!”文井同志见他急得那样,让他“稍等”,转身回会议室,很快又出来,告诉于会泳的助理:“这么急,那就先走吧。回头我再告诉他们。”我明白,文井同志准是进去和出版局局长通了气,经局长许可才做出决定的。我和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笑,点了点头,便算告辞了。江青先期到大寨,据说要在那审查录音情况,所以录音组演唱人员和注释人员跟着去,以便随时询问。实际上,在大寨期间,只是偶尔讨论注释工作,大部分时间花在劳动和看电影上,9月20日撤离大寨。回到北京,到大寨一个多礼拜的活动情况,我向文井同志作了简要的汇报,他这才放下心来。

“托起沉重的木船”

1976年10月7日早晨,我和往常一样,上了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我从水房提着两个热水瓶,正要往楼里走,文井同志从后院西门走进来,把我叫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昨晚都抓起来啦,你先别说,听消息。”过了一两天,“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消息才慢慢传开。我很佩服他获得信息之快捷。10月中,出版社党委正式向我传达中央发生的大事,并通知要开全社性揭批“四人帮”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党委领导和各个部门作政治表态,特例为我安排了个人发言,从第一个向我透露消息,到为我安排发言,我十分感激文井同志在政治上对我的信任和关怀。

1978年4月,人文社决定与《人民日报》合写一篇关于“评《水浒》”的文章,文井同志让我参与执笔。我到人民日报社去同文艺组研究文章的大纲,《人民日报》文艺组因为曾发表过反面文章,所以提出文章开头先“还债”,我不同意,说:“在《水浒》问题上,我们无债可还。”他们说:“你们出版《水浒》不是用了梁效写的《前言》吗?”北大清华批判组确实写过《前言》初稿,但当时姚文元批示,文章不要署名“梁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文井同志说:“既然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前言》该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水浒》的《前言》实际上是人文社重新写定的。我把情况告诉他们,说:“我们认为写定的《前言》没问题,不必‘还债’,‘还债’的内容你们单独处理。”回社后,我向文井同志汇报了讨论情况,文井同志高兴地说:“你做得对,咱们的《前言》没问题。”文井同志对于出版

物的把关,主要是审查序文和前言,尤其严防政治上出问题,力求平稳。他抓工作,总是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先把政治关,后把质量关,从不陷于具体的事务之中。

文井同志一生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他从挂名社长到实干社长,为人文社出了不少力,然而他又从人文社得到了什么呢?他原来所住东总布胡同60号的两间平房,是中国作协的房子。红庙的楼房,是文化部批下来的。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就在红庙那不算宽敞的楼房里过着清贫的日子。有一天,我到红庙看望他,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他招手让我到他卧室,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字,说:“你给我读一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按他说的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幅字是中央美院朱乃正教授写赠文井同志的,抄的是陆游的词《好事近》:“岁晚喜东归,扫尽山环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澄碧。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重云外,有沙鸥相识。”我读完后,他点了点头说:“怎么样,你体会体会。”这首词是陆游壮志未酬在山阴老家赋闲时所作,一腔幽怨,却故作旷达语。也许朱教授写这首词意在给文井同志一点慰藉,而文井同志读来却别有怀抱。至于他让我读一遍,似乎是向我表白的一种方式,又似乎是对我的一种劝慰,或者诸多意思兼而有之。我朝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笑,一切都在不言中,真是“笑而不答心自闲”,这是“赋诗言志”的一种方式。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古典诗词,竟然有此妙用!

90年代初,文井同志已离休多年,我问他写些什么,有什么创作规划,他说,老了,写不了大东西,只想写点回忆往事的小文章。有一天,他托人给我捎来一份墨宝到办公室,是他为我写的一张小条幅,作为纪念。我打开一看,上面写了四句类似儿歌的小诗,曰:

小民弄小技,大帝唱大风。

傻子要活命,只好来雕虫。

条幅前头钤了一枚闲章,曰“难得明白”,还有一枚生肖印是一只玉兔,后面落款云:“东海兄一笑 严文井(钤‘严文井’章) 一九九一年岁末。”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文井同志却反其意而说“难得明白”,看来他并不想糊涂,而是想弄个明白。聪明过人的文井同志说“傻子要活命,只好来雕虫”,是很有意思的。这首小诗,是自励,也是对我的劝勉,于是我把它当作“座右铭”,时时提醒自己,甘当“傻子”,安心搞文学研究,玩那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多年的实践,使我愈发明白文井同志真是个明白人。

“飞向纯洁的蓝空”

文井同志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末,写了不短童话和寓言,后来也写起散文,是颇有影响的一位作家。70年代末,他选编了一本童话散文,就用1955年写的童话《小溪流的歌》的篇名作书名,1979年春在人文社出版。3月20日,他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领取签名赠书。我向他表示祝贺,他说实在惭愧,写得太少了,真对不起广大少年儿童,但因忙于行政,也没办法。同年7月,他接到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信,请他为该馆题词。他又把我叫去,说:“为李白题词,什么话都不好说,很难妥贴;我想了个主意,就是用李白的诗句写李白,你看怎么样?”我说:“好啊,这个主意很好。”他说:“我对李白不熟,也不擅长诗歌,所以想麻烦你帮我用李白的诗句集一首纪念李白的诗歌。”我说:“从王安石取杜诗作集句诗,不少人效法,集句也就成了一种常用的形式。我可以试试看。”于是我便代他找了一些李白诗句,

编成这么一首诗:

明月出海底,太白出东方。
北斗酌美酒,醉后发清狂。
高歌振林木,风卷绕飞梁。
心随长风去,天外恣飘扬。

我把这首集句的草稿拿给他时,还附了一些可供选择的诗句,让他自己再修改或补充。他把首联换成“凤飞九千仞,太白何苍苍”,叫我到他办公室一块推敲。我看他改得很好,说不必再动了,就这么定下来。

1981年5月,我被借调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写《诗人李白》画传,为了获取相关图片,我和摄影师一起到长江流域考察李白游踪,直至年底才回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小书《诗法举隅》,样书已到北京,翌年年头,我寄一册赠文井同志,他收到书后,寄来这么一封信:

东海同志:

《诗法举隅》收到,谢谢!

看目录,就知道这是一本很有分量并引人兴趣的书。

我曾多次想请你来家谈谈,但因你常常外出,无法如愿。此次返京,如有功夫,晚上来家谈谈,还是非常欢迎的。

请原谅我的官僚主义,我不知道你的宿舍地点,此信只好寄到我社传达室转,不知能否顺利地到达你手中。

新年好

文井
元月六日

接到信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便到他家拜访,并汇报了在长江各地考察的一些情况。话题转到我那本小册子《诗法举隅》,我说这是我大学本

科毕业论文改写的,改得比较仓促,所以很难说得透彻。他说读者反映还不错,并表示他也比较赞赏。文井同志说“多次”想找我谈谈,我感激他对我的器重,但又害怕他对我的器重,所以在交谈中,我常常“顾左右而言他”。文井同志是很有创作才能的儿童文学作家,然而由于长期担任行政工作,极大地影响他的创作成就。待到他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已经老了,写不动啦,我时常为他感到惋惜。古人所说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真是鞭辟入里。

上世纪90年代初,文井同志对近代文学颇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到红庙他家拜访,他问我搞什么,我说还是研究古典文学,他说:“搞那些老古董,不能说毫无意义,但我看你还是去研究近代文学,可能更有意义。要关心现实,不要只钻故纸堆。”我笑了笑,心想他到底是老革命啊,我对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是很尊敬的。他打电话要借龚自珍集子,我帮他弄到一个选本,以为读读选本也就够了,他却不满,还让宋红君为他借了《龚自珍全集》。从近代思想家的先锋,到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他都下了不少功夫,似乎还在发扬五四精神,追求民主科学,探索救国之道。在他的鞭策下,后来我和宋红一起编著了《南社诗选》。

2005年7月20日,文井同志安详地离开人世,带着未了的夙愿走了。然而他所创作的儿童文学将永远滋润一代又一代的幼小心灵;他对于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也将铭记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里。他的事业是不朽的,可以安息了。到八宝山告别时,我为他献上一副挽联,曰:

小溪歌唱,滋润玉苗,童心开发催花放;

大业思成,更新文学,书海导航破浪飞。

丛刊2016年第1期目录(总第198期)

新文化运动研究

知识的“救济”与失效——对民初“调和论”的重新思考 孟庆澍

“新青年”的觉醒——对五四时期小团体实践的考察 李培艳

走向白璧德:学衡派之“前史”——以梅光迪、胡先骕为例 李欢

作家与作品

危机与救赎:一个新文化人的“南渡” 刘奎

“误译”与创造:鲁迅《药》中“红白的花”与“乌鸦”的由来 张丽华

进化论与法布耳:周氏兄弟1920年代写作中的博物学视野 王芳

鲁迅在教育部的儿童美育工作与《风筝》的改写 陈洁

浅析《呼兰河传》的形式探索 仲济强

未完成的“现代主义”——《上海的狐步舞》探讨 邢程

丁玲研究

“新的写作作风”——探讨丁玲整风之后的报告文学写作 刘卓

延安时期丁玲女性书写的转变与“新人”塑造 王书吟

——社会史视野下的《夜》的重读 王书吟

近代中国的“主体妓女”表象及其夭折 江上幸子

文学史研究

“隐士派”还是“酝酿者”:论小品散文初期的分化 裴春芳

翻译作品的“大众本”改编与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 李淑英

——以1933年鲁迅《毁灭》译本的两次改编为中心 常楠

文献史料研究

胡风剧本《虎列拉之影》手稿的再发现——兼谈胡风早年的戏剧活动 常楠

虎列拉之影 张光人